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莎伦·安·霍尔特：

## 在美国史研究中，女性活动仍被认为微不足道

邢承吉 刘雨君 鲁迪秋 于梦圆

莎伦·安·霍尔特 (Sharon Ann Holt) 是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阿宾顿校区 (Penn State University's Abington) 的历史学教授。她于1991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主要从事美国史和公共史学的教学和研究。她的丈夫迈克尔·朱克曼 (Michael Zuckerman) 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美国史教授，熟悉美国早期史研究的朋友们或许了解，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候选人邢承吉与清华大学博士陈志宏曾于2016年对朱克曼教授做过一次关于美国早期史的访谈。

朱克曼教授荣休后将自己的两千余册美国历史藏书无偿捐献给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资料室。2018年5月30日下午，在参加“朱克曼教授赠书捐赠仪式”之后，邢承吉和美国历史访谈团队



以此为契机，邀请霍尔特教授与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师生进行了一场座谈，探讨女性在历史学界的位置以及美国公共史学研究。

name): 美国妇女表面看似幸福，实则埋藏着痛苦和无声的挣扎。妇女被视为家庭主妇，被认为应该相夫教子、采购日用品、整理床铺。专业研究物理、数学或历史学的女性注定无法获得幸福——她们神经质且没有一丝女性气质——她们离开家庭追求事业是违反自然规律的。到20世纪60年代，很多女性主动放弃自己的学业，全力支持自己的丈夫实现学术梦想，她们因此获得了“Ph.T” (Putting Husband Through, 让丈夫完成学业) 的称号。

霍尔特教授，我们首先想了解您的求学经历。您与我国著名学者、第一位女性大学教授陈衡哲一样、毕业于瓦萨学院，能否介绍一下这所女校？

莎伦·安·霍尔特：瓦萨学院曾经是一所女子学院，也是美国著名女子学院里唯一实行男女同校的学院。从1972年起，该学院从低年级开始男女同班教学；我在1976年入学，当年5月，瓦萨招收的第一个三年制男子研究生班完成学业。到了20世纪70年代，像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等许多男子学院在法律强制要求下，陆续开始招收女学生。大部分学校都很不情愿。我有朋友在普林斯顿和达特茅斯读书，她们经常遭到骚扰。有些男学生把她们的书扔进泥里，在她们的宿舍和个人物品上涂抹红色颜料。在普林斯顿，女学生不能加入一些俱乐部，参与社交活动。

瓦萨很有吸引力。男女同校政策一施行，男生就占据了领导职务，如学生会主席、高级班的班长和学院报纸的编辑等。我入学时，人们正开始重新反思男女同校的意义，意识到历史的重负始终在女性一边。在瓦萨，女性就是传统，而非人们口中的“男女同校的女学生”(coeds)。就读四年间，我从女性立场出发，试图弄明白：男女同校是什么样的？对男学生来说，男女同校的体验是什么样的？当权力关系翻转时，我们如何处理传统与革新的张力？我曾是一个年轻的女性主义者，现在只不过更为年长了。

所以能否说，瓦萨的多样化教育，使您很早就有了女性主义者的认同？

莎伦·安·霍尔特：我很想承认这一点，但实际并非如此，在去瓦萨之前我就已经是女性主义者了。在我10岁的时候，我父亲就送给我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女性的奥秘》明确告诉我，作为女性，我必须在心智生活和心灵生活之间做出选择。这是个伪命题。比如，让一个人从“工作”和“爱”里做选择是极其愚蠢的，“工作”与“爱”都会让人幸福，是人的本质，让人从中做选择，极大违背了人之为人的现实。没有人费心思从女性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因为人们普遍认为女人

(下转8版) ➔

教育女性就是为了  
让她们培养优秀的  
儿子？

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莎伦·安·霍尔特教授参与我们的访谈，聊聊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女性职业史学家的境遇以及美

国的公共史学。

我们与不同时代的女性学者做过访谈。从哥伦比亚大学的爱丽丝·凯斯勒-哈里斯 (Alice Kessler-Harris) 那里，我们了解到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女性学者的艰难境遇；随后，我们又采访了70年代成长起来的玛莎·豪厄尔 (Martha Howell)；从年轻的汉娜·法伯 (Hannah Farber) 教授那里，我们发现，与

之前几代女性学者的遭遇相比，在性别平等和多样化影响下，新一代年轻学者的经历已经完全不同了。当然，只有几代人的不懈斗争，才能换来我们今天的改变和进步。

贝蒂·弗里丹 (Betty Friedan) 在1963年出版《女性的奥秘》(Feminine Mystique)，书中开篇便指出“无名的问题” (the problem that has no

◀ (上接6版)

多释读中，这是目前看来最简捷合理、站得住脚的解释。所以塔克拉玛干应即维吾尔语“吐火罗人之地”的意思。

H·W·贝利早已揭出，吐火罗之名源自东伊朗语 *tugara* (又写作 *tukhara*)，译言大山。它被大月氏人用来指称天山以南东部塔里木盆地上各个被征服的绿洲地区及其人群。“吐火罗人”并不是那里土著居民的自称，而是由月氏人所赋予的一种他称。阿姆河两岸的古地名吐火罗斯坦 (Tukharistan，玄奘称之为“覩货逻国故地”)，也是按同样的道理由西迁中亚的月氏人带到那里去的。从吐火罗

斯坦到塔克拉玛干，不过是把名词组合的后一部分从 *-stan* (译言……人据有的地方) 改为 *-makān* (其语义已见前述，*Tukhari -stan > Takli -makān*) 而已。

虽说 *makān* 存在于当代突厥系的许多语言里，惟其被先后借入突厥诸语的时代似不会太早。维吾尔的祖先人群用 *makān* 来置换 *-stan*，一定发生在他们由佛教改信从西面传来的伊斯兰教，因而有越来越多的伊朗语及阿拉伯语词汇随伊斯兰教的传播而涌入葛逻禄语或回鹘语的过程中。检索目前所能见到的属于突厥语系的各种古代书面语文献，十三世纪之前似乎还没有见到借自波斯

语的 *makān* 一词出现于其中。据此或可推断，今日维吾尔语里的塔克拉玛干这个地名，应该出现于十四世纪之后。从塔里木盆地东半部的“覩货逻故国”(玄奘语)到囊括塔里木盆地内全部沙碛在内的塔克拉玛干，这两个专名虽说是“同名异译”，但同源的后出地名所指代的地理范围，不仅已经大幅度地向西伸展，而且从原先主要着眼于由绿洲贯通的盆地周缘，转移到盆地中央渺无人迹的沙海。

北方民族史研究中的“审音勘同”技术，是由被乾嘉汉学推向极致的古汉语音韵学与欧美历史比较语言学两相结合的产物。使用这项技术来

从事否认，即用以说明 A 不能与 B 相等同，比用它来证实两者之间的某种同一性，亦即说明 A 就是 B、或者 A > B，常常要有效得多。因为人类语音受限制于其天然条件，往往存在带有纯粹或然性的“同音”现象。两个词语音同，绝不等于它们必定就同义或同源，那是需要兼用其他证据的支持才能慎重推定的。另外，在分析比较一组特定词汇的语音时，对辅音的考察，往往比相对元音的考察更为重要。这是因为辅音所决定的一个音节的开启及闭合特征，在该语词从一种语言进入另一种语言时，会比较稳定地保持下来。而元音的变化就不那么容易把握了。

七十五年前，罗常培写过一篇题为“音韵学不是绝学”的文章。可是他的这篇文章好像是白写了。审音勘同至今被学历史的人当作“绝学”，视若畏途。其实它并没有那么难，并不需要“精通”所涉及的多门民族或域外语言，才能把它作为一种技术来使用。其实只要有一定的古汉语音韵学常识，懂一点相关语的正字法规则、构词及词形转换特征，有一点基本词汇的积累，再以过去那些学术大师的相关著述作为范例，就可以在学做起来的过程中，把这门技术掌握得越来越纯熟。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